

■教育时评

文·李斌

档案保管,不要只想着收费

档案保管费,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大学毕业了,如果不是到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档案就成了“流动人事档案”,要交给就业地或户籍所在地的就业服务机构保管,于是便产生了托管费用。

近日,有媒体跟这笔钱较上了真。据报道,一些大城市每年收取的档案保管费超过1亿元,而全国每年人事档案收费多达数十亿元。如此巨额的费用,去向却成了谜,目前尚无省份公开人事档案保管费的收支明细账目。

档案管理,转入转出、开具证明等等,的确要人力、要场所,有一定的成本。不过,从现代行政伦理来看,却不一定有花销就有理由收费。人事档案的使用方和受益者是国家和社会,就业服务也属于公

益服务,所以档案保管应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即便委托就业代理机构保管,费用也应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消化,而不应该转嫁个人。由此来看,档案保管费的合理性的确存在问题。

而且,这样一笔收入,收多少、怎么花,也需要有个交代。根据往常经验,以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代表的政府非税收入,由于收支不透明,常常被当部门隐瞒和挪用,甚至被截留私分。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档案保管费就一定存在类似问题,不过如果不说清楚,难免会遭致怀疑。况且,在依法行政、政务公开、财政透明日益成为共识的当下,于法有据、于事合理、有效监督,本就应该成为各种收费的基本前提。

更关键的是,应提升人事档案公共服务质量。事实上,高收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档案管理的覆盖面大大降低。一些工作不稳定、收入较低的大学生为躲避缴费不惜违法违规,私下保管自身档案;更多的人则选择停交档案保管费,成为“弃档一族”,部分地区“死档”比例超过两成。现实中,管理不善造成人档脱节、档案造假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更不用说办理相关事务时的不便了。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用改革理顺收费和服务的关系,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只要加快简政放权改革,取消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才能遏制权力自身的收费“本能”,增强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促使政府职能由前置审批管理,更多

转向后置监管和提供服务。去年全国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要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降低收费标准,建立健全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制度。从档案管理费的例子看,当前亟待提上日程的,是理顺和清理各类收费,减轻公众负担,倒逼相关部门产出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事实上,江苏、山东青岛等地,已经迈开第一步,率先取消了档案托管收费,更多地方的就业服务部门,还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要推动档案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档案系统。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新要求,更是信息时代、大数据时代的新方向。

■教育快讯

《中小学校管理评价》从细节处评学校

出文件、开会议、搞检查,看材料等手段长期使我国中小学校管理的督导流于表面。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由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编写的《中小学校管理评价》一书力争从细节处入手,解决中小学校“评什么”“怎么评”等关键问题。

《中小学校管理评价》日前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分为学校治理结构、学生管理、课程教学管理、教师管理、教育资源管理、安全管理6章,共计20余万字。

该书主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和地方明确将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教育系统按照“管办评”分离的基本要求,切实提高政府“管”的针对性、学校“办”的规范性以及社会第三方“评”的科学性,形成三者边界清晰、良性互动“共治”的新格局,建立多元化学校监督、指导、评价体系。

《中小学校管理评价》从普通读者和关心教育改革发展的公众视角出发,选编了大量基层学校的实践案例,深入分析学生减负、教师培训、师德考核、校园安全等中小学校教育教学的难点、热点和疑点问题,为评价和指导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提供了标准和依据,也从加强和完善教育督导评价方面进行了梳理和指引。

据了解,为了编写此书,教育部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大量前期调研,分赴各地各校,通过实地考察、座谈访谈等方式,听取教育部管理部门干部、督学、校长、教师、家长及社会公众等不同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并吸纳了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专家研究成果。

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负责人指出,在我国已出版的教育类出版物中,以教育管理者、教师、家长和社会公众为对象,全面、科学、专业地介绍中小学校教育评价体系的,《中小学校管理评价》是第一部。

上海成立民办教育发展基金会

由政府倡导、民办学校联合发起,以支持民办教育发展为宗旨的公益性基金会——上海市民办教育发展基金会近日揭牌成立。上海市教委表示,该基金会的成立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上海在民办教育改革上的“先行先试”。

据新华社报道,截至2013年底,上海共有大中小学各级民办非营利性学校800余所,另有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核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1200多家。民办教育已成为上海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在私立教育发达的地区和国家,私立学校资金来源主要由学费收入、社会捐赠和公共财政三部分构成,其中社会捐赠比例通常占30%至40%。而目前上海民办学校大多由企业投资举办,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学费和办学积累,后续发展资金普遍不足,急需建立政府、民办学校、社会等多方共同投入支持民办教育发展的新机制。

上海市民办教育发展基金会由上海杉达学院、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等7家单位联合发起,目前已筹得首批7730万元资金。基金会成立后,将依法募集社会资金,大力扶持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改革发展,包括弥补其学费收入及政府投入不足、支持其教育教学和师资队伍建设和发展等。同时充分发挥民办学校体制的灵活优势,推动捐赠制度的完善和捐赠文化的形成。

近期,基金会将实施“六大项目”。其中,“同舟计划”将资助民办高校科研团队,推进民办高等教育内涵发展;“萌芽计划”将资助民办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和创新能力提升;“追梦行动”将扶持持有创新、实践性强的学生社团项目。此外,基金会资金还将用于奖励民办教育突出贡献者和民办高校优秀辅导员,编写民办教育丛书等。

■教育改革

文·本报记者 吴佳坤

“居然有这门专业?”当被记者问及是否了解女性学专业时,包括高校大学生在内的不少被采访者一脸茫然。“女性学专业发展遇到的一个很大困难就是不

广为人知,这让在此领域教学的中国教师十分困惑。”女性学专家、湖南女子学院女/性别研究与女性教育中心主任刘人锋颇为遗憾表达了上述观点。

历史发轫源远流长

女性学专业源于西方妇女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8世纪,女权思想就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并且发展起来。

刘人锋介绍说,随着参与妇女运动的知识女性对妇女所面对的剥削和歧视的深层社会、文化、政治原因的探索,在20世纪70年代初,有关妇女问题的杂志、报纸、著作大量出现。这些报刊和论著既产生于第二次妇女运动,也对妇女运动向学术界延伸,以及此后的女性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通过著书立说,创办报纸杂志,活跃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妇女运动进入高校和研究所,通过教育和研究手段,启

发妇女觉悟,对传统学科进行批判、改造和重建,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女性学。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包括女性学在内的众多西方学术流派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进中国。在西方女性学的启发和影响下,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许多研究人员通过对传统文化、传统学科以及现实中妇女问题的反思,从历史、文学、经济、政治等各个角度对妇女问题展开研究。

据了解,2006年4月国家教育部确定女性学为高校新增专业。至此,女性学已正式进入国家教育体制。

专业建设迎现实所需

在刘人锋看来,设置女性学专业不仅是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国策的重要举措,更是培养优秀女性人才的重要环节。

201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确定妇女在健康、教育、经济、决策与管理、社会环境、环境、法律七个发展领域及各领域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以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推动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刘人锋认为,尽管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但是性别平等与性别公正并没有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性别问题仍然需要人们去了解、研究与重视。女性学的核心理念是倡导性别平等意识,促进性别公正。设立女性学专业,旨在培养具有社会性别意识,具备一定性别分析能力与行动能力,并立志从事性别公正事业的人才,专业的设立将通过人才培养的环节使得政策、纲要得以落实。

当前,妇女发展作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为促进妇女发展与进步达成了多项协议,将妇女问题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消除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妇女产生的不利影响正逐步纳入各国政府的重要议程。

当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组织和社会团体认识到推动性别平等与促进性别公正的价值。刘人锋认为,现行的女性教育与女性人才培养机制,尚不能满足社会对女性人才的需求,“我们需要反思与改进女性人才培养的思路,尤其是如何培养高素质女性人才。”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设置女性学专业是女性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刘人锋认为,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后,中国的女性/性别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面临显著困境。依附于法学、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一级、二级学科,各高校已开设了多跨学科的妇女性别研究课程,但是不论在普通高校还是女子学院,女性学几乎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身份,更没有主流化。

在《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提出,“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和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提高女性学学科等级”。刘人锋认为加强女性学学科建设,提高女性学学科等级,女性学专业的设置势在必行。

“虽然有一些重点院校在二级学科目录下开始招收相关女/性别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但总体而言女性学的身份非常尴尬。如何使女性学从一种视角转变成为一种学科范式,进而获得主流学科的认同,是学者们寻求突破的方向。”刘人锋说。

消弭性别歧视需社会合力

在被问及现在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时,刘人锋认为,妇女发展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女性的歧视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我们的社会责任由对女性的歧视和限制,任由对女性的侵犯却得

不到有效制裁,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

刘人锋看来,保障妇女权益需要有能够实施性别教育,开展性别学术研究、性别政策制定与落实的专业人才。而这些专业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女性学专

一场场大比分赛果,让青奥会足球比赛反映出参赛青少年队实力的差距。作为以汇聚、交流为目的青奥会,这些并非把成绩放在首要的赛事,恰好提供了正视中国校园足球现状的机会,使人们能够从国外青少年足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寻找中国足球需要“补课”的内容。

“体能”“技术”的进步难以兼得

“我们的孩子在五、六岁时就开始练球,不少人还效力于同一家青少年队。”冰岛青奥男足主教练斯维尔里松说,他作为冰岛足球的雇员,带领本国U16年龄段国家队已经有13个年头。“我在挑选球员时,并不是在全国找出个人能力最强的球员,而是参照制订的战术,找到最合适的队员。”

斯维尔里松不仅长期执教青少年队,还拥有自己的足球学校。他表示,虽然冰岛远远算不上足球强国,但强悍的球风是该国从青少年队到国家队一贯的风格,使得教练在选材上并不会太大的障碍。

“我们从小身体素质训练都是在学校里进行的,而在少年俱乐部,我们更注重战术的训练。”在青奥会小组赛打入3球的冰岛球员古德约翰松说。

像古德约翰松这样的成长轨迹,是国

外特别是欧洲足球人才培养模式的必由之路。而在中国,身体训练与技战术训练却往往本末倒置。由于在儿童阶段并不一定都经过正规的训练培养,身体素质和基本功参差不齐的球员,却要在青少年队中被套上同样的战术要求。

“草根”“职业”的对接难以顺利

现代足球的诞生地英格兰,社区业余俱

乐部被认为是青少年从“草根”到“职业”的“孵化地”。3岁半的孩子就可以进入这些俱乐部,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中的佼佼者可以到包括英超俱乐部在内的92家职业俱乐部下设的足球学院深造。拥有自己的“足球学院”,是俱乐部能否迈进职业联赛的“刚性门槛”。

而在中国,对于不少家长来说,在如今中国足球各方面都处在低谷的大环境下,让孩子,特别是女孩今后以足球谋生,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家长的顾虑,使得很多颇具天赋的小球员,在升学阶段的抉择中,被埋没在升学考试的“过独木桥”中。

“校园足球越往高年级走,开展越不好。”在不久前结束的全国学生运动会上,曾率领上海队打去年全运会U18女足比赛的曹杨二中领队倪伟国认为,校园足球为职业足球输送人才,应该是金字塔结构,基座大塔尖才能高,但是由于球员在进入

高中后基本功已定型,而且还要面临升学的压力,导致了人才在这一阶段断档。

记者了解到,即使是把“足球梦”坚持到了高中阶段的学生,也并没有明确的生涯规划,大多是考虑先闯过高考,凭借“体育单招”闯过独木桥,再选择是一般就业,还是踢职业足球。

在北京一所职校上高二的宋阳说,他刚开始接受专业训练时很渴望踢职业队,但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现在更想通过足球这个路径去考大学,体育单招对我们的优惠还是蛮大的。”他说。

人大附中是中国目前开展青少年足球最好的中学之一,校队教练胡建平认为,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很难愿意在这个环境下让孩子踢球。“中国家长过于急功近利,望子成龙。”

以欧盟为例,许多国家都建立性别平等促进机构,拥有专门处理或协调促进性别平等的部级编制,有的国家则建立了多方参与的促进性别平等的政府委员会,强化政策落实的后续评估与监督监察。

与此同时,应该在社会上培养公民平等、公正的性别意识。刘人锋说,我们应该意识到,尽管不同生理性别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在人格上,男女享有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图说教育



暑假期间,广西钦州市17名在外就读的大学生和本地老师组成“爱心义教”团,利用社区培训室对110名7至13岁的留守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暑期义教活动,帮助他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暑假。据介绍,这个“爱心义教”活动在钦州市已连续举办了6年。新华社记者 张爱民摄

“体教结合”仍“在路上”

——从青奥会足球比赛透视中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

文·新华社记者 郑昕 朱竑 陈刚

“体教结合”的探索还在路上

“日本和韩国也是踏踏实实搞了30年校园足球才能腾飞,这说明中国足球也可以通过这条路搞好。”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主席刘彭芝说,关心推动青少年足球事业应是全社会的责任。

不仅是近邻日、韩,就连巴西世界杯冠军德国,也是在卧薪尝胆开展校园足球之后重新崛起,它的成功不外乎“尊重规律”一条原则。从2000年以来,德国青训系统投资达到约7亿欧元,目前有全国380所训练基地及28所精英学校,职业俱乐部中还有45所优秀人才中心。实现了从校园到俱乐部的对接,数以万计的德国小球员学习之余,能够在绿茵场上奔跑,学习与训练有了合理的配置,才有了世界杯上的“水到渠成”。

“给中国青少年足球一点时间。”这是在全国学生运动会和青奥会上,不少校长、教练的共识。当下中国足球“体教结合”的进程仍在摸索阶段,面临的制约因素既有场地设施缺乏等“硬件”,也有学校不够重视、家长对子女出路的担忧等“软件”问题。

体育和教育部门要让校园足球迎来春天,关键还在政策的细致与落实。从今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加大了本级公益金对青少年足球的资金投入,从过去的每年4000万元增加到5600万元,将在3年内把足球定点学校从现在的5000多所增加到2万所,并聘请国外高水平青训教练,打造连接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的纽带和桥梁。

“集中各方面资源打基础,培养一批综合素质高的校园足球教练,推广足球训练、竞赛模式,让更多孩子参与这项运动。”中国足协副主席、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不久前谈到了对中国校园足球的设想,就是让学校成为足球人才的“蓄水池”。

“体教结合非常重要,教育与体育主管部门共同来做好这个50年大计。球员出路更宽了,竞争就会趋于良性,从而提升整体水平。中国足球将来应该像足球发达国家一样,大学出球员,球员同时也是大学生,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体教结合。”来自四川的基层教练樊渝说。